

●文化对话

“伟大哲人”与“现代诗人”

——泰戈尔与老子、李白的跨文化对话

尹锡南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现代印度作家中与中国文化联系最深的一位。泰戈尔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对中国道家经典与唐代诗歌信手拈来地援用引申,足以见出中印文化跨文明神交的独特魅力。

泰戈尔自幼年时代起就对近邻中国及中国文化怀有深厚而浓烈的兴趣。在1897年创作的戏剧《拜贡特的巨著》里,泰戈尔展示了他对中国文化魅力的认同。这是一段剧中两个人物的对话:

“格达尔:拜贡特先生,……中国的音乐经典大约没有吧?”

拜贡特:(非常活跃地)没有,那是没有,你在哪里得到线索了吗?

格达尔:岂止线索,我还弄来了一个手抄本呢!这个本子很宝贵,你看。(自言自语)我是从一个中国鞋匠那里要来的一个老账本。

拜贡特:好呀,看起来是用纯中文写下来的古老本子,还弄不懂,真是奇事,字很清楚,太好了,是很有用的东西。”^①

泰戈尔对于中国文化的深爱,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和诗人李白的推崇备至。一定程度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他自己作为世界著名哲人和诗人的自觉选择。哲人身份

^① 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1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3页。后简称《全集》且只标明卷数页码。

使他自觉认同老子,而诗人身份又使其倾心属意于李白。他借用老子思想阐发自己对于生命、人性、和平等问题的睿智见解,也引用李白等中国诗人的诗句来阐述自己关于东西方诗歌乃至东西方文明的观点。

一 “伟大哲人”:泰戈尔与老子的精神契合

据学者考证,唐代时期,老子与印度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唐朝皇帝姓李,因而老子也就成了唐朝的皇族远祖,道教也就跟着沾光,位列儒、佛之前。唐高宗时,更是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也就享有了崇高的地位。著名僧人玄奘游学印度17年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因为种种原因,唐太宗命令精通印度梵文的玄奘与人一道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了梵文。老子的思想连同他的著作出关到了玄奘当年取经的“西天”印度后,因为其内涵特质和思辨理路几近于印度的佛经、奥义书乃至甘地思想,所以受到印度人普遍而长久的欢迎。^①例如,2003年6月23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便饶有兴致地引用了《老子》第47章中关于知识与认知的名言:“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作为文化视野异常开阔的印度作家,泰戈尔受惠于老子著作并对其引用论述挥洒自如自然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泰戈尔引用老子的话先是在1924年的中国演讲中,1930年5月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发表长篇演说《人的宗教》时,再次引用老子的话。泰戈尔引用的是英译文。据学者考证,英译文“基本上是忠实的直译,但读起来比原文更易解而有新鲜味。足见文化、思想的交流会产生新的东西,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会遇见新的启发。”^②

从中文译本来看,泰戈尔多次引用老子。这里略举几例:

^① 参阅薛克翘:《老子与印度》,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15页。

^② 朱维之等著:《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7页。

第1处——“老子曾经说过:‘不知常,妄,妄作,凶。’(Not knowing the eternal causes passions to rise; and that is evil.)……让我们去死,一如你们的老子所说的那样,却依然不朽。”(1924年,中国)

“老子说过:‘不知常,妄,妄作,凶。’他还说过:‘殁身不殆。’当我们失去自己的肉体生命时,我们就走向死亡,而当我们丧失自己的人性时,我们就趋于毁灭。人性就是人的‘达摩。’(1930年,英国曼彻斯特)

第2处——“老子在讲到至善之人时说:‘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He quickens but owns not. He acts but claims not. Merit he accomplishes but dwells not in it. Since he does not dwell in it, it will never leave him.)。我们可以出卖我们的身外之物;然而,我们不能出卖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这种对真理的完完全全的吸收,属于完美天堂;它在我们的自我意识的炼狱之外。事实证明,到达这一天堂,需要经历文明发展的一个漫长进程。”(1924年,中国;1930年,英国曼彻斯特)

第3处——“当他们(指中国人,下同)返回家中,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大师老子在进行教诲时所说的‘有德司契,无德司彻(Those who have virtue(dharma) attend to their obligations; those who have no virtue attend to their claims.)’这句话时,他们就会明白‘文明’一词的含义了。”(1924年,中国)

“老子还说过:‘有德(达摩)司契,无德司彻’与内在的‘达摩’无关而与外在的诱惑有涉的进步,试图满足我们的无穷无尽的要求。然而,作为一种理想的文明,给予我们放弃权利的充分能力,一种认识无限并激励创造的能力。”(1930年,英国曼彻斯特)^①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泰戈尔已把老子思想有机地化为己用,

^① 以上引文,1924年的演讲辞参阅李南译:《在中国的演讲集》,《泰戈尔全集》(第20卷);1930年的演讲辞参见刘建译:《人的宗教》,《泰戈尔全集》(第20卷)。

这是另一种倾向鲜明的品评或曰赞赏。那么,泰戈尔是在哪些方面认同欣赏他的中国先师呢?

首先,泰戈尔从美学角度解读进而倾心于老子的美学观念。

老子作为中国美学的开山祖师,其美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和谐统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无”和“有”的统一,“虚”和“实”的统一。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天地万物才能流转不息,变化无穷,斑斓多彩。如老子在《道德经》第2章里说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由于老子强调和谐统一的美学观念,他对于天地之美万物之美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宇宙自身的和谐,强调人顺应自然,反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违背自然和谐最高规律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自然本来就是存在着最完美的和谐关系的。

和谐与协调是泰戈尔美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出发点。在泰戈尔的讲演著述中透露出的思想基调是,在分歧中求统一,在对立中求和谐。如泰戈尔说:“在我们两眼之间有一种和谐的结合,使它们动作一致。同样,在物质世界中,热与冷、光明与黑暗、运动与静止之间也有一种牢固的连续关系,正像钢琴的低音键和高音键之间的关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宇宙中这些对立没有带来混乱而是带来和谐的原因。”在泰戈尔的美学体系中,“韵律”是一块基石,也是他的最高理想。和谐、矛盾和流转变这三者齐备才能构成泰戈尔心目中的“韵律”。泰戈尔说:“倘若我们以完整的感情去观察,那么韵律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分割开来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不缺乏美的。在世界上,学会整体去观察美是美感的最终目的。”(《全集》卷22,第101页)正因为他强调韵律,对于西方追求速度以及模仿此种现象的人,他很不以为然:“当我们跟在西方背后追求速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任何脱离了韵律的永恒标准的运动,都会陷入不能控制的爆炸的混乱中。”韵律成了泰戈尔美学体系建构的重心所在。他的和谐统一以韵律为其表现形式。韵律的背后隐藏着和谐统一的影子。在这一点上,泰戈尔和老子的千年对话本身就是一种风景别致的和谐,是中印美学思想的共鸣,人类智

慧穿越时空的回响。如此,我们便可更好地理解泰戈尔的话:“这位伟大的中国哲人(老子)说:‘益生曰祥。’增寿则可实现永生,而又超越生命和谐的境界。山松挺拔伟岸,但它的一分一厘都保持着内在平衡的韵律,所以即使看似滋生无度,它实际上却在自我控制方面表现出无言的优雅。”

其次,泰戈尔的哲学宇宙观与老子有相似之处。

有学者认为,老子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模式。^①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这句话进行倒读,可以发现,老子心目中的宇宙原始状态是一和谐而不可分离的整体。他的核心词是“道”,而“道”的原始表现状态则为混沌。如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超时空、超感觉与超物质的精神实体,它永恒存在且无人能御之用之。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充满了变化的观点。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皆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而动力来源于永恒存在的“道”。它主宰万物的发展变化,孕育万物。老子的“道”有二重性。就本体论而言,它是宇宙之根本,永恒不变;从辩证法角度而言,它生长万物,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最后原因及总规律。

对泰戈尔哲学思想影响甚巨的是《奥义书》和吠檀多等古代印度经典。他坚信,神就是无所不在的实在——“梵”。泰戈尔哲学是抽象一元论与特殊类型有神论的奇特综合。在他看来,实在即“梵”就是惟一。泰戈尔把神或“梵”看作是三种实在中的最高存在。他在各种场合对于神或“梵”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给予不同的名称如“世界意识”、“最高意识”、“无限人格”、“绝对存在”等。他认为神或“梵”是我们经验中的一种原初物质,也是一种植根于客观现实生活的一种“自明的实在”。它是有限与无限、有属性和无属性、个别与全体、一与多的“统一”和“和合”。另一方面,

^① 汤一介:《文化的互动认知》,《中外文化与文论》第9辑,四川教育出版社,第23页。

印度人在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各种印度语言时,书名就叫《道奥义书》,既有趣又恰当。这使印度读者在阅读时仿佛亲切地捧读本国的古籍,同时,也使读者对老子产生了一种对《奥义书》那样的神圣感。这足见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同时也可想见《道德经》与《奥义书》的思想存在相似之处和交融之点。《道德经》中的“道”和《奥义书》中的“梵”的确有些可以比较的地方。如老子认为,“道”乃宇宙根本和万物根基且永恒存在,《奥义书》认为“梵”乃一切的根本和宇宙的始因,如《弥勒奥义书》中说:“诚然,太初,此世界唯大梵也,为‘太一’,为‘无极者’”^①;老子认为“道”是一种抽象的无形存在,是不可名状的,而《奥义书》也认为“梵”是不可描述的、超言绝象、不可思议的;但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独立实体,《奥义书》则认为梵是不被产生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总之,老子的这类与《奥义书》相似又不雷同的思想“无疑使印度人读来亲切,容易产生共鸣。”^②在此意义上,泰戈尔心目中神秘的“梵”与老子玄妙的“道”有了足够的对话基础。泰戈尔还用辩证发展的观念来写诗为文和观察这个世界。印度学者认为:“泰戈尔认为有一种力量或者说动力处处都在起作用,他是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以及二者最终的统一的。”^③这和老子也是惊人的接近,为他们思想碰撞灵魂交融提供了极大便利。

再次,泰戈尔与老子的神交也有他们在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契合。

老子从宇宙和谐的理念出发,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所谓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也。照老子看来,宇宙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统一的代名词,由于后来的“道生一”到“三生万物”的过程衍变,宇宙开始分化并与原来的理想和谐状态“渐行渐远。”在此意义上,人应该“反本”和“归根”,

① 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② 参阅薛克翘:《老子与印度》,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第14页。

③ [印度]希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返回到“道”的原始理想状态中,这样才可清除“人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老子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书中。如他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他还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僭于欲得。”老子还把他的思想推演到社会领域,提出了对后世思想家政治家皆有价值的见解,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老子思想是建立在减损人们欲望基础之上的自然主义,它在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

印度学者认为,在伦理学方面,泰戈尔“观察了积极的人文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并为现代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至上的风尚而深感焦虑^①。也就是说,泰戈尔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投下了关注的目光。佛教思想在这方面的影响甚巨。佛陀的“中观观点”建立在否定自我放纵的思想之上,它同时反对禁欲主义,佛语中的涅槃意思就是安详和欢喜。佛陀一边承认欢喜,一边又不断提醒人们,尘世之物如昙花一现,迷恋红尘中的万物是愚蠢之举。泰戈尔的为人文皆体现了佛陀的这一“中观”原则。另一方面,从人的本性或独特性出发,泰戈尔与西方人相比有自己的不同理解。西方人一般是从人具有理性和征服自然万物的能力这两大特性的角度去解读人的独特性。而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泰戈尔在赞美人为万物之灵长的同时,以超越功利、效率的标准更全面地观察了人的独特性。泰戈尔认为,人类真正领悟自己的灵魂是摆脱财富的羁绊,人类的进步源自自觉的舍弃、克制和远离贪欲。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借用自己戏剧中人物的口说过的话:“陛下,你的错误就在于你自以为可以用暴力夺取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也就因此归你所有。你不知道那抓紧在手心里的东西会从你指缝间悄悄溜走,只有放松,你才能占有。”(《全集》卷17,第467页)这不禁令人想起老子的话:“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如此,我们也可理解他与老子的精神交融:“我们(印

① [印度]希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度)的圣典说:‘罪寓于贪,死寓于罪。’你们的哲人(老子)也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这些格言警句中包含着人们长期积累的智能。……老子说:‘以其不自生,故能生长。’生命的法则即存在于此。”(《全集》卷20,第71页)

二 “现代诗人”:泰戈尔对李白的别样欣赏

泰戈尔曾通过汉诗的英译本了解到中国文化这瑰丽一角。他在1924年访华时说:“我一直在阅读你们的一些富于诗意的作品的译文。你们文学中的品位令我着迷。它具有你们自己的特色,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文学中,我从未见过与之相似的文学。”(《全集》卷20,第12页)他不光读了李白的诗歌,还欣赏了王维、杜甫等人的作品。中国古代诗歌对其影响非常明显。泰戈尔尤其喜爱中国精巧短小的唐诗。他的文章涉及到的诗人主要是李白。在《现代诗歌》一文中,泰戈尔讨论什么是文学和生活的“现代性”时,先自我设问:“这个‘现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的回答是:“不是从个人的迷恋感情,而是以永恒的迷恋之情看待世界,这就叫做‘现代’”。泰戈尔所理解的“现代”,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互相“迷恋”、互相敬重的理想状态。接下来,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泰戈尔将我国大诗人李白推到了前台:“中国诗人李白创作的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他仍不失为现代诗人。他的观点就是现今观察世界的观点,他以简洁的语言写下了五言诗和七言诗。”^①

我们先来看看泰戈尔引用的四首李白的诗——

《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秋浦歌》之十三

^① 倪培耕编选:《泰戈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90页。

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

郎听采菱女,一道夜歌归。

《夏日山中》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长干行》

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在李白生活的年代里,道教在文人中盛行。道教俘虏了唐代众多文人的心。道教抓住了人们“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的共同心理,既不禁欲,又要生长,享受欢乐与超凡脱俗兼而得之,因而,比起儒佛,道教自然就在人们,特别是文人圈子里占了上风。在唐代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文人中,李白是一典型人物。如果从他“十五游神仙”算起,他的一生都在与道教打交道。但必须看到,尽管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他却在无意之中超越了道教的地平

线,弘扬起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

在李白身上,道家的原典《庄子》对其创作思想的直接影响不可小视。庄子在美学上紧承老子的哲学美学理念,提倡“法天贵真”的美真结合。庄子物我交融的美学理想深深地吸引了李白。李白在其创作实践中体现了道家学派尤其是庄子的自然观、人生观与宇宙观。有学者说:“道家由重天机而推出忘我及对自我能驾驭自然这种知性行为的批判,在中国诗歌中开出一种可谓‘不调停’的调停的观物感应形态,其结果,由演绎性、分析性及说明性的语态的不断递减而达至一种极少知性干扰的纯山水诗,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①李白所欣赏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一种绝少知性干扰的天然境界。他在面对俗界问及“何意栖碧山”时笑而不答。实际上,眼前将飘然远逝的“桃花流水”本身只是能指,它们的所指却是一种“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理想自然状态。而李白诗中所谓的“心自闲”也就是庄子之所谓“虚静”,几近于“坐忘”和“心斋”,乃是通往理想自然状态的必由之路径,它使人明心观物,洞见宇宙万物之本质。在“别有天地非人间”一诗中,“天、地、人的生命生机显发,就是真,就是一幅天、地、人生命自然朗显的图画”。^②在天、地、人三重结构中,人返归生命自然。

再来看泰戈尔。具体说来,泰戈尔在以下几方面与李白展开了心灵交流。

在美学理念上。与庄子紧承老子美学理念“道法自然”而提倡“法天贵真”的美真结合的主张相类似,泰戈尔肯定“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并且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说:“真理只是‘一’,当我们的感知了这个‘一’时,我们的心便体会了那‘无限’了。而所谓的‘美’也就是这个‘一’的调和的实现。他认为通过真的观念我们认识了宇宙法则(几近于中国的“道”),通过美的

^① 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第98页。

^②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0页。

观念我们认识了宇宙中的和谐(几近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真与美作为统一体的来源,同时反映了宇宙中和谐的法则。在真与美之关系上,泰戈尔说:“我们通常称之为美的那些东西……之所以令我们愉悦,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着最高真理。”这种最高真理就是万物的和谐,即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总之,泰戈尔的美学观念几近老子和庄子,这使他与深受老庄思想浸淫的中国“现代”诗人李白在诗心对话上占据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平台。李白诗歌中表现出的唯美唯真倾向和人与自然的谐和态度对于泰戈尔的诗心来说,是非常具有亲和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庄、李白与泰戈尔之间隔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心灵对话得以完成,这本身便反映出中国印度文化的可通约性,也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钱锺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出世与入世的态度上。泰戈尔的人格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追求宁静的自我修养与向往荣达的自我实现,是他人格心理上的一组二元对立。他常常赞美古代的仙人們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净修林生活,自己也选择了远离喧哗世界的地方定居,但他又禁不住外界的吸引和心灵的骚动,多次从宁静的角落走向世界。他的思想里虽然积淀着传统的印度文化因子,但现代思潮对于他冲击甚巨。西方文化的熏陶,现实生活的魅力,家国天下系于一身的高度责任感消解了传统印度文化的出世主义影响。于泰戈尔而言,“来世的呼唤虽然隐约可闻,但现世的呼声似乎更令诗人心动。”^①而另一方面,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具有双重性:其虚静人生的理想人格既具有超越的性质,又具有“即世而又离世”的自由人格特征,因而其理想人生也可以说是艺术的人生。进一步说,这种理想人格决定了,道家道教的人生态度几近于泰戈尔在他所谓“艺术家的宗教”原则指导下的人生态度。李白由于受到唐代道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之影响,也由于他在仕途受挫后情感转

^① 参阅侯传文:《泰戈尔诗选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第72页。

向自然和寻求心理平衡,他的所思所为就体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态度及审美倾向。这是一种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奇妙之境,人生之悲苦惨淡在诗人的梦幻般的行为体验中得以自我消解。泰戈尔在文中所引李白的诗《夏日山中》便是一首几近于自我消解人生痛苦的诗。诗人在自然的环绕呵护之中尽情体验生活之乐之美而淡忘人生痛苦,一切皆真,一切皆美。这种皆真皆美的行为体验不可能不打动同样爱真爱美的泰戈尔的一颗印度诗心。

在对待妇女及爱情上,泰戈尔是东方人,他的妇女观和爱情观也是纯粹东方式的。在论述文明问题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妇女的问题:“在历史的现阶段,文明几乎都被男性所独占,这文明是权力(强权)的文明,在这文明中,妇女被抛到一旁而黯然失色,因此,这文明失去了平衡。”^①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妇女这人类另一半的无限关爱。在爱情上,泰戈尔忠贞不二。他与妻子于1883年结婚。妻子在家庭生活、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方面给予了泰戈尔不小的帮助。不幸的是,1902年,妻子与世长辞。泰戈尔悲痛万分,至死未续继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于妇女的关爱和敬重使他阅读李白诗歌时产生了共鸣。李白在《秋浦歌》里用近乎于白描的手法描写的民间男女之恋情,再配以自然万物和谐之背景,的确使泰戈尔的爱美之心得到了极大愉悦。李白的《长干行》一诗乃是他的代言体诗歌中的一首。李白时代的代言体诗歌,十有八九是写女性的。那时,敏感的诗人们怀着一颗人道主义的同情之心,代女性立言,为女性的命运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呐喊呼号。李白怀着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怀着社会上一颗颗被压抑被漠视的女性之灵魂,并从中宣泄心中郁积的文人生存环境之艰难而带来的不快情绪。《长干行》一诗里隐约可见李白对于女性的态度。正因如此,对女性持有深厚关爱之心的泰戈尔才说李白的《长干行》里表现了一个“少妇的哀情”。

^① 《论妇女》:刘湛秋主编:《泰戈尔文集》(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